



秘闻

实录

我所知道的叶群

● 官伟勋著

新登字137号

我所知道的叶群

官伟勋 著

*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(北京百万庄路2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5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8.25 字数 176千 插页 4

1993年5月北京第1版 199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5071-0163-0/I·150

定 价 5.20元

在“文革”
接见红卫兵。



叶群和黄永胜(左)
接见空军部队。



左起：吴法宪、林豆豆、叶群、林立果。



林豆豆（左）下乡时
与房东大娘合影。



林豆豆
近照。



林豆豆与王淑媛（中）、本文作者合影。



林豆豆（右二）和爱人
张清林（右一）。



目 录

几句开头话·····	(1)
一、狂飚乍起·····	(4)
二、寒夜不速之客·····	(23)
三、使功不如使“过”·····	(33)
四、初进毛家湾的意外发现·····	(41)
五、叶群为什么最怕听“血”字·····	(48)
六、叶群谈起王熙凤整人眉飞色舞·····	(62)
七、给叶群介绍《三国演义》·····	(83)
八、叶群说过的两次假话·····	(91)
九、叶群和“钓鱼台”之间的微妙关系·····	(98)
十、叶群为何对袁世凯的发迹史感兴趣·····	(111)
十一、文物大掠夺·····	(122)

十二、适得其反..... (144)

十三、林豆豆的三次自杀..... (158)

十四、我所知道的林彪..... (187)

十五、你知道林彪有什么病吗..... (204)

十六、“文化大革命”与“夫人专政” (217)

十七、拾自“震中”和“次震中”的一鳞半爪..... (228)

十八、余波..... (245)

目
录

几句开头话

对一个人的一生，对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，能够发生重大影响，或者能够引起根本转折的一些事件，在其最初起动的時候，往往是十分平常的，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，在根本意识不到它有什么了不起的情况下发生的。

当人们明确意识到自己已被卷入一场重大历史漩涡时，那早已是波涛汹涌地以冲垮一切的奔腾咆哮之势一泻万里了。这时，任何裹挟在其中的人，已无力挣脱这一巨流的冲力，更不要说力挽狂澜改变其方向了。

大江东去，浩浩荡荡。有的成了弄潮的英雄；有的葬身鱼腹；有的伤痕累累被冲到岸边成了心灰意冷的飘蓬。洪流继续流向远方。它平静、安逸，用有机的无机的，植物的或动物的遗体或碎渣，滋补着两岸的旷野，谁也不再计较它昨日吞噬了多少生命和财富。这就是历史。

历史就是一切，个人的命运是不足道的。

事过境迁之后，当年轰轰烈烈的壮举，催人泪下的悲剧，在许多人的心目中，只不过是残阳落照中几块供人赏玩的断碣残碑，成了听着几杵疏钟，映着半江渔火的闲人们的谈资。

时时也会有人慷慨激昂议当年，舞文弄墨论英雄，但这却往往是为了现实的需要。

人民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，这是悲剧。付出了太大的代价，而又没有认真地保存并认真地清理史料，因而无法引出必要的教训，这是双重的悲剧。这双重的悲剧还会引发又一次悲剧。

中国已经在一个圈子里循环了几千年，因而也停滞了几千年。美国有一位历史学家曾“称赞”我们有一种在全世界“最成功的保守思想”，这种保守思想给我们带来了“超稳定的政治结构”。所有自上而下的改革，或自下而上的起义，只不过起了加速或延缓改朝换代的作用。江山依旧，只是朱颜改。皇上的姓名换了，构成权力结构的性质如故，生产力如故。

为了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，就要尽可能地详细占有历史资料。一切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，尤其对“最初起动”过程有所了解的人，都有责任把有关的见闻如实地留下来。这是对历史负责，对子孙后代负责。

重要的不是个人是非，而是为了建立更高层次的真正堪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结构，不再出现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不正常现象，不再出现“夫人专政”的现象。

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愿望与动机，我仅把我在那些难忘岁月中的一些见闻记录下来。对于某些重大事件，由于我所处的地位，知道的很少，连全豹的一个斑点也谈不到，充其量只能算是豹身上的几根毛，但这是几根真正的毛，既没臆假，也没粉饰。

我不想在这里歌颂什么，也不想在这里暴露什么，更不想在这里表白什么。歌颂、暴露、表白并不都是什么不好的事。但离开事实的歌颂、暴露与表白，却绝对是对历史的亵渎，同时也就玷污了自己。如果有的读者发现我没有像某些作品那样描写某些人或某些事的话，我希望您能予以谅解。为了对您，也对所有关心我国这段历史的人负责，我只能照实写我自己的所见所闻，还有一些所为。

这一初衷，使这部作品不会成为想象与虚构可以任意驰骋的场所，但可以成为有兴趣探索研究这段历史大结构原型的只砖片瓦。

一、狂飚乍起

1971年，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处副处长。这年8月，我和另外两位同志下部队检查工作。先到兰州部队空军，到过—个航空学校，又到过一个设在戈壁滩深处的保卫核基地的高炮师，之后又去了新疆。然后从新疆返回，经宝鸡南下入川，经贵州来到云南昆明。三人中一人中途因事返京，剩下我和从部队调上来帮助工作的小张。

驻云南空军的指挥机构，设在离昆明若干公里的深山中，招待所是一幢漂亮的二层楼房。一边紧靠公路，隔路就是机关和机关食堂，另一侧是苍翠欲滴的山坡。环境十分优美幽静。虽说远离城市，但副食品供应还可以，伙食花样多，做的味道也不错。

我已失去当时的出差记录，不能准确记得是哪一天到的这个地方。我本来是有记日记的习惯的，一天也不曾中断过。但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因我在“文革”初期就成了“重点批判对象”，又见过“反胡风”和“揪三家村”时从书信和

日记中“查”出的“反革命罪证”材料，也怕“造反派”从我的日记中“鸡蛋里挑骨头”，找出什么“三反罪证”，所以便将我的日记转移到住在城内的岳母家。在风声进一步加紧时，老人家出于对我的爱护，便一把火把我自从进城起一天也没落记了整整16个年头的日记全烧光了。从此，直到1976年底，我再也没记过日记。

尽管我没有那时的日记，但我仍然可以肯定，我是在9月10号前后到达昆明的。因为就在这之后的不几天，我遇到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。我和小张，被当地部队一位L处长和他所带的一位干事，异常亲密地“陪”上了。他们超过对上级机关来人予以必要照顾的需要，跟我们“朝夕相处”“亦步亦趋”，我们无论干什么他们都要紧紧跟着，除了上厕所和睡下之外，怎么甩都甩不掉。

刚到的第一天，这里的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（原文艺工作团，“文革”中改此名），就有人听说我们来了，主动来找我们谈话，反映他们队里的一些情况，尤其要谈对他们的直接领导，也就是对L处长的一些意见。我们约好了谈话时间，但很快就发现，根本没办法跟他们交谈，因为L和他的那位孙干事，寸步不离。“你有事忙去吧，不用老陪着我们”，我对L说。

“不忙不忙”，L处长谦恭地哈哈腰，不卑不亢，满脸笑容，外表依然不失对上级机关来人的“尊重”，但语气和神态上却流露出一种不管你怎么说，我就是不走的外软内硬的劲儿。

“你们尽陪我们，你们处里的工作怎么办？”

“陪着你就是工作。有什么要我办的，尽管说。”他中等

身材，清瘦的面孔，白白的皮肤，眼镜后面闪烁着两只聪明世故的小眼睛，两道眉毛，黑而且直，显得很秀气。听了我的话，不紧不慢胸有成竹地把我挡了回来。

“我们想去宣传队找几个人个别谈谈。”

“行啊！我们乘车去找他们谈，或叫他们到招待所来谈，都行，你定吧。”他的话语表明，他们就是不肯离开。

为什么非要紧紧跟着我们不可呢？我跟小张商量。小张扶了扶他那老往下滑的黑边眼镜，想了想说：“是不是他知道下边对他有意见，怕下边向我们反映？”

时处“文革”期间。虽说部队机关里的各个“造反派”已实现了“大联合”，但各派之间遗留下来的矛盾和恩恩怨怨，却远未消除。我以为小张的猜测有道理，舍此也难有别的理由可做解释。

既然如此，我们决定利用午休和晚上的时间自己步行去宣传队找人谈话。但很快便被我们发现，这个办法也根本行不通。因为每当我们离开招待所外出的时候，L处长和他那小干事，便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冒出来，跟上我们了。

后来我们还发现，这还不是我们来到此地后，遇到的唯一的新情况。还有一点也与别处不同：我们每到一地，当地的部队首长，总要安排时间与我们见见面，谈一谈，了解我们来的任务，同时也给我们介绍些情况。这里却不，他们没做任何安排，偶尔在食堂里碰上了，也仅仅限于彼此介绍一下姓名职务，点点头而已。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。连最普通的问候、寒暄，身体如何？出来多少天了？到过哪些部队等通常询问一类的话都没有。

我们到他们机关里看了一下，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冷清。几乎没见到一点欢快活跃气氛。处处有一种神秘感、压抑感。

这里所说的“神秘感”、“压抑感”，也是我后来知道事件真相之后才回忆起来的。当时只感到冷清就是了。

其实，这位朝夕寸步不离地“陪”着我的L处长，在当时，他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只不过是奉命行事。上头下了命令，让他一天到晚地陪着我，他就寸步不离地跟着我。即便是给他下这道命令的人，从日后逐步揭开的“幕布”看，他们也未必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但他们已经意识到空军领导机关出了大事，因为当时空军领导机关所有出差在外的人，毫无例外地一律受到了“重视”与“陪同”——被看起来了。后来还知道，有的当时已下令逮捕了。

L处长本人对我一直很友好。彼此都很尊重。他还主动邀我游览了滇池、龙门、西山古寺。但就是不肯与我须臾分离。

天天呆在一起，又不能不说话，有一天，他给我谈起大军区司令员谭甫仁被暗杀的经过。他谈这件事的那种扑朔迷离的情调，既流露了他自己对当时局势的那种困惑不安感，也更进一步地增加了我对当时环境的一种莫名的神秘感。

他又点上一支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问我：

“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？”我摇了摇头。他歪过头去，把吸进去的烟，吐出一道长长的烟柱，顺便喘了口粗气，十分干脆地说：“是被暗杀的！”

“破案了没有？”那时的保密工作做得好，加上我又是初

来乍到，没听说过。所以突然一听，吃了一惊，忙探过身去问。

他摇了摇头，又深深吸了口烟，说：“没有。刚发现了个头，又断了！”

他默默地又吸了几口烟，屋里只有我们俩，小张在另一房间与那位干事在一起聊天，十分安静。他往前拉了拉坐椅，压低嗓门，跟我谈起了这件暗杀案的经过。

“这件事很怪，到现在也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谭甫仁住在军区大院的一个套院里，是一幢两层小洋房。警卫是很严密的。在他出事之前，他家养的一条狼狗突然死了。后来又发现门上的锁坏了。这些事，现在看来当然都是很可疑的。但当时都没当成什么事，因此也就没引起警惕。”

“那天夜里，谭甫仁回家，已经很晚了。他上了楼。因为那几天正好他的小姨子来了，小姨子跟他夫人住在一起，大约他是怕影响她们休息，就没进他夫人卧室，径自走进他常住的另一个房间。其实，他小姨子那天并没在他夫人屋，而是睡在楼下的另一个房间里。”

“谭甫仁刚进屋，就有人进了他夫人房间。这个人手握手枪，逼问谭甫仁在什么地方，谭夫人见势不妙，便大声喊叫，实际上是示意谭甫仁赶快脱身。”

“这个时候，大约谭甫仁听到了动静，立即悄悄出屋下楼，来人可能听到了，开枪先打死谭夫人，便出屋下楼追谭甫仁。谭刚下到门厅平地上，来人追上连开两枪，谭饮弹倒地。”

“住在小院内另一处的秘书，听到枪声，边穿衣边向这边

跑。途中问在院里站岗的战士，‘哪里打枪？哪里打枪？’

‘打枪？’战士茫然不知所问，显然他在打瞌睡，打枪那阵儿，他睡着了。

“这时，谭甫仁的小姨子和谭的警卫员也闻声跑了出来，他们曾隐约听到刚才的质问声、喊叫声和下楼的追杀声。但没有看到杀人的人。”

L处长说到这里，双手叠着放在翘起的那条腿的膝盖上，看着我，不说了。

我问：“这个案子该不难破吧？又是弄死狗，又是破坏锁，谭一到家他就知道，而且直奔谭的卧室，中间还有一道一道的岗哨，了解这些情况又能作案的人，不会很多嘛！”

L处长听我说完，又点了一支烟，没回答我的提问，继续往下说：

“后来有个进大院挑粪种菜的老乡，用大粪浇菜时，发现粪桶里有支手枪，报告了有关部门，有关部门一查，这桶粪就是从大院里掏出去的。再一查那支枪，这种牌号的枪，军区只有两支，两支都在军区保卫部，都由保卫科的一个科长保存。

“事情已经有了眉目，自然要先从保卫部查起，看看这两支手枪还在不在？如果不在，可能被什么人偷去了？没想到，当办案人员去找保管这两支枪的科长调查时，这个科长从枕头底下掏出另一支枪，“砰！砰！”两枪，把第一个进屋调查的人打死了。接着，他又开枪自杀了。刚找到的这么一个线头儿，就这么断了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事情既然出在保卫部，就得从保卫部查起。保卫部部长这时正在北京学习，便通知他回来。没想到，他一回来就上吊了。”

他叹了口气：“这个线头又断了。”说着把两手一摊，“至今还是个谜！”

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件事？纯属无事闲聊？还是另有什么缘由在心头？不过，他肯跟我谈这类当时还属机密的事，这至少也意味着一种信任、友好。

直到我回到北京，听了关于“9·13”事件的传达，我才另有所悟。他对我讲这些，并不是信口开河全无所由的。尤其在我想到他在讲这件事之后，最后讲的那句话：“建国以来从未发生的事都发生了，唉！真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！”这句话，非常充分地表达了他当时十分困惑的心境。

他接到命令，让他“陪”着我这位上级机关来的人。虽不知究竟什么原因，但也已经隐隐约约地听说上头出了什么大事。他“陪”了我多天，见我“浑然不觉”，不由也相信我不像有什么大问题的人，但我已成了被怀疑被监视的对象，他大约对我有些同情。他想跟我交换一下对当时局势的估计，却又不敢；一点不谈，他又憋不住，所以便把谭甫仁被杀一案端出来，想藉此跟我探讨一下一片朦胧的背后，究竟蕴藏着什么真实的内容。

而对于我来说呢，却根本没往这方面想。所以，我像听故事一样，听完了也就完了。不过，他讲完这件事之后，满脸那种狐疑不安的神情，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而且确也在一定程度上感染了我的心境。几年之后我听说，L处长也

在这次的“9·13”事件中受到了牵连，还因此被处理回了东北老家，可见他当时的不安也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了。不过，就我对“9·13”事件的理解看，他充其量也不过是“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”中的一条无辜的小鱼小虾。他没有可能成为这一事件的知情者和参与者。

我和小张在云南，总共呆了大约不到一个星期。这时我们离开北京已快两个月了，我们决定回京。离开昆明空军部队机关来到昆明市，住进该部队的招待所时，L处长依然紧紧地“陪伴”着我。在市内招待所住着等飞机时，该部队的政治部主任，也就是L处长的顶头上司，也住在这里。是巧合？还是亲自监督把我们送上飞机？就不得而知了。开始，我听说他也来了，我还以为他要在我们返京之前，听听我们在这里调查研究的汇报，通常也都是这么做的。没想到，他根本没跟我们照面。我当时还颇为这种“缺乏必要的礼貌”感到不快，直到“9·13”后，我才恍然大悟。

L处长对我们一直很友好，直到送我们去机场时，他还让司机拐了个弯儿，到全国著名的白药厂，去帮我们买了些云南白药。这是一种很难买到的贵重的药材。

在北方，这时已是中秋季节。但在这四季如春的昆明，却依然到处花红树绿，景色怡人。一进机场就更美，更加令人心旷神怡了。跑道两旁的开阔地，全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一尺多高的各种颜色的野花。再往远处看，天地相接的地方，就是“五百里滇池”长联中所说的各处名山。时已下午，太阳即将落山，光线分外柔和，“睡美人”般的西山，安卧在布满金黄、紫红晚霞的天幕下，显得一切都那么和谐美好。